

# 从汉代宾客之盛衰谈班固 《答宾戏》之主旨<sup>\*</sup>

周兴陆

**【提要】**对班固《答宾戏》的主旨，学界存在不同的阐释。《答宾戏》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之间存在“互文性”，班固与东方朔、扬雄对“大汉”与“战国”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他借主客问答来批评二人“处皇代而论战国，曜所闻而疑所觐”。汉初游士宾客繁盛，武帝一面打开选拔官吏的通道，让士人有为官的途径，一面采用极端严厉的手段诛灭游士宾客。此后每况愈下，宾客甚至沦落为鸡鸣狗盗之徒。这是东方朔、扬雄二人作文的背景。而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大力推崇儒学，再次抑制豪侠宾客。崇儒抑侠成为主流的价值观，马援、冯衍都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这也体现在《答宾戏》中。《答宾戏》既为作者“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确立合理的思想根基，也为当时的士人指出“立德”、“立言”的正道。

**【关键词】**班固 《答宾戏》 宾客 崇儒抑侠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2-0089-09

《答宾戏》是班固的一篇重要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曰：“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sup>①</sup>萧统《文选》“设论”类收录了该文。

对于班固《答宾戏》的主旨，龚克昌先生阐释说：“作者通过宾主之问答，力图揭示无功、有功的分别，在于弘道与否，以此说明自己不汲汲于富贵功名，笃志于为文著述，无怨无悔的心志。”<sup>②</sup>周启成先生等解说：“班固才盖当世，而章帝雅好文章，因而班固颇得宠幸。章帝每有巡狩，就献上赋颂；朝廷每有大议，就使质难公卿。但官运不通，位不过郎。有感于东方朔、扬雄怀才不遇而作《答客难》《解嘲》，因而模仿他们而作此文。”<sup>③</sup>这两种解释之间实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的解释侧重于说明笃志为文、无怨无悔的心志；后者则谓主旨是模仿东方朔、扬雄，抒写怀才不遇之感。这都是本于《答宾戏》前的小序，但未能作全面深入的理解，故而出现了偏差。

《答宾戏》前的短序曰：“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50011)的前期成果。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5页。

② 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后汉》，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③ 周启成等：《新译昭明文选》，(台)三民书局2014年版，第2233页。按：周先生的解释依据《后汉书·班固传》。

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sup>①</sup>这段文字又见于班固的《汉书·叙传》，是作者的自序，当为可信。关键是对它如何解释。龚克昌先生抓住的是序中“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一句；周启成先生则着重关注“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一句。若反复推敲全文，可知该文主旨其实是在于“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对于“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班固是明确否定的，故而作此文“折之以正道”，表明“君子之所守”，也即为什么他能“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正确理解班固《答宾戏》的关键有二：第一，班固《答宾戏》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之间是什么关系？班固是否与东方朔、扬雄有同样之“感”？第二，对于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宾客游士，班固是什么态度？是否感慨不遭其时？

### 一、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到班固《答宾戏》

班固《答宾戏》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之间存在文本的“互文性”。《答宾戏》中主人对宾的回答，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东方朔、扬雄的回答。

东方朔在武帝时上书陈述农桑耕战、富国强本之策，而不见用，因此作《答客难》以发牢骚。开篇客以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居卿相之位来诘难。东方朔“喟然长息，仰而应之”，回答的要点是此一时彼一时，时异世改，不可同日而语；若苏秦、张仪生活于当今之世，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应该修身自得，等待时机。若遇到时机，他也会像乐毅、李斯、酈食其“说行如流，曲从如环”。<sup>②</sup>如果说东方朔感慨遭遇了天下太平、四海一家的盛世而没有纵横驰骋的机会的话，那么扬雄则是遭逢哀帝之时，丁明、傅晏等外戚与佞幸董贤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他只能全身远害，淡泊自守，以至落拓不振。扬雄在《解嘲》中极力渲染仕途的危险。“一跌将赤吾之族”，“攫拏者亡……位极者高危”，“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sup>③</sup>正是对哀帝时黑暗政治的揭露。此时士处于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

虽然东方朔和扬雄对“今世”的描述互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流露出对“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战国时代的向往，希望能获得“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价值肯定。这显然违背了大一统的汉帝国的利益，不符合明帝、章帝时汉室中兴的国家要求。所以班固《答宾戏》“折之以正道”，就是要纠正东方朔和扬雄这种错误的价值观。《答宾戏》中的主人也是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但他口中的战国时代，是“王途芜秽，周失其驭……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虎争”。<sup>④</sup>在此纷争扰乱之世，士人因势合变，“据微乘邪，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为憔悴”，<sup>⑤</sup>侥幸得福，祸亦随之。而主人口中的“方今大汉”，扫除芜秽，铲平荒榛，同源共流，禀养太和，是盛美的皇代，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很明显，班固与东方朔、扬雄对“大汉”与“战国”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朔和扬雄笔下的战国，是游士充满机会的时代。而因为时代的原因，东方朔与扬雄对于汉世的认识也有不同：东方朔笔下的汉世是万物各得其位，让人无所作为的；扬雄笔下的汉世则是无所厠足、动辄得咎的，是“不可为之时”。班固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今昔观，赞美所处的时代是“皇代”，而战国则是乱世，借主客问答来批评他们“处皇代而论战国，曜所闻而疑所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批评其价值观的错误。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此文作于章帝时期，“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5页。

② 《文选》，第2003页。

③ 《文选》，第2006~2011页。

④ 《文选》，第2017页。

⑤ 《文选》，第2018页。

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sup>①</sup>“自通”说显然不符合《答宾戏》的主旨。洪迈批评班固《答宾戏》等是“屋下架屋，章摹句写”，<sup>②</sup>也非公正之评。

班固《答宾戏》为了确立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合理性，辨析了“客”所谓应该及时立德立功，而以著作为余事的问题。《答宾戏》中的“主人”列举了从舜时的贤臣皋陶到汉初的张良，“言通帝王，谋合神圣”，建策立功，这些都是“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并不是像战国的游士凭借骋辞游说而得。如陆贾、董仲舒、刘向、扬雄等人著书立说，究圣人之壶奥，照耀后世，立言亦足以不朽，仅次于前举立功之人。而伯夷、柳下惠、颜回、孔子等太上立德，坚守志向，安贫乐道，“真吾徒之师表也”，是士人的典范。<sup>③</sup>班固在这里完全是立足于儒家的根基，为士人指出了在当时的出路：建策立功，靠的是“俟命而神交”，不可妄为；可以努力的是立德与立言。立德与立言，即使暂时暗昧，而终究可以彰显于后世，这才是“君子之真”。至于若伯牙、师旷、王良、扁鹊等人专精于一技，班固也不愿意置身于他们的行列。他自己的立命之处，正在于“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即立德立言。班固既为皇代中的士子指明了人生出路，又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与东方朔、扬雄文中的主人仅仅反击客之“病甚”、不知权变、不明大道，也是不同的。

东方朔和扬雄都对苏秦、张仪等游士宾客表达了敬慕之意。东方朔《答客难》中，客曰：“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东方先生曰：“（苏秦、张仪）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廩，泽及后世，子孙长享。”<sup>④</sup>《解嘲》中扬雄一口气列举文种、范蠡、百里奚、乐毅、范雎、蔡泽等先秦六位游士宾客和汉初娄敬、叔孙通、萧何等并皆称是“万乘师”，为可为于可为之时，矫翼厉翮，恣意所存，建立不世之功。但是班固的《答宾戏》，则贬斥游士宾客“非韶夏之乐”、“非君子之法”。<sup>⑤</sup>在班固眼中，“道不可二”，而游士宾客们背离了儒家之道，因而最终都落了个囚身灭宗的可悲下场。为什么他们对待游士宾客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游士宾客在汉代地位的升降、班固对待策士宾客的态度有关系。<sup>⑥</sup>

## 二、西汉宾客之盛衰

战国乱世中，游士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游士不事生产，身份自由，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他们本身没有实在的力量，只有依靠虑事定计，不治而议，打动人主，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游走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玩诸侯于股掌之中，大有“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的权势。<sup>⑦</sup>战国四公子，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sup>⑧</sup>若冯谖本是贱士，而孟尝君待之以上客之礼。虽然宾客的成分复杂，如荀子所谓“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sup>⑨</sup>但是成百上千的宾客，足以构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是政权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秦国曾要下逐客令，驱逐游士宾客。

①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73页。

②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0页。

③ 《文选》，第2015~2022页。

④ 《文选》，第2000~2001页。

⑤ 《文选》，第2017页。

⑥ 在《战国策》和涉及战国的文献里，“游士”与“宾客”是通用的，前者侧重于出计策、献谋略，后者侧重于“说行则留，不行则去”的自由身份。至汉代则“策士”罕见，多用“宾客”一词以指称，故后文也径用“宾客”。

⑦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5页。

⑧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5页。

⑨ 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事实上最后大乱天下、推翻大秦帝国的正是宾客的力量。田儵、田横“皆豪，强宗，能得人”，在陈涉王楚后田儵自立为齐王，田横自刎后，五百宾客随之自杀，刘邦惊叹曰：“田横之客皆贤。”<sup>①</sup>项梁、项羽叔侄早期避仇吴中时，“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sup>②</sup>这是项羽江东军的骨干。张耳早年是战国魏公子信陵君的宾客，因为妇家丰厚，他也招致了千里客。“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sup>③</sup>汉高祖刘邦豪爽任侠，本来也是宾客起家。《史记·高祖本纪》载：“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沛焉。”<sup>④</sup>后沛地百姓杀沛令而立刘邦为沛公。刘邦敬仰战国公子能养士，“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sup>⑤</sup>受战国养士之风的濡染，他也广聚天下英才，萧何、曹参是最早的拥立者。楚人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sup>⑥</sup>刘邦的同乡世交卢绾，“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sup>⑦</sup>沛人任敖，“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sup>⑧</sup>周苛自卒史从沛公为客，从入关破秦，刘邦立为汉王后，以周苛为御史大夫。<sup>⑨</sup>刘邦正是依靠这些著名的宾客在义军中发挥骨干作用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汉政权。

刘汉取代嬴秦后，各地拥众自立的势力，依然是威胁中央政权的隐患，因此也先后被铲削，如上引逃入海岛的田横。又如陈豨，“少时，常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sup>⑩</sup>陈豨宾客盛多，擅兵于外，后来真的反叛了，自立为代王，被高祖斩杀。剿灭这些乱世枭雄，建立稳固的专制政权之后，大汉帝国才真的如东方朔《答客难》所谓“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sup>⑪</sup>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稳固大一统的帝国里，游士宾客失去了身份的自由，似乎无用武之地。典型的游士、游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sup>⑫</sup>

但是，汉初文、景帝时期分封同姓诸侯王，同样为游士宾客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给汉初政权的稳固制造了新的隐患。《汉书·邹阳传》曰：“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sup>⑬</sup>汉初各地的诸侯王，依然怀有战国四公子招贤纳士、以相倾夺、登基大宝的美梦。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齐地邹阳、吴地严忌、淮阴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这些宾客没能劝阻吴王叛乱，就离开吴国而从梁孝王游。梁孝王贵盛，亦善待文士，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四方豪杰游士莫不招至门下。淮南王、衡山王、楚元王、济北王等无不以师友之道待士，帐下宾客奔竞杂沓。这时的宾客依然像战国游士那样“不任职而论国事”，虽然不担任实际吏职，但皆奉若上宾。枚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sup>⑭</sup>景帝召拜他为弘农都尉，他都不乐意，以病去官，复游梁。司马相如辞赋不为景帝所喜好，便离开京都而从梁孝王游。可见这不是个案。

诸侯王身边的宾客，为主人献谋略，出计策，排难解纷，一如战国时的策士。吴王、楚王、淮

① 《史记》，第2648页。

② 《史记》，第296页。

③ 《史记》，第2572页。

④ 《史记》，第344页。

⑤ 《史记》，第2385页。

⑥ 《史记》，第2697页。

⑦ 《史记》，第2637页。

⑧ 《史记》，第2680页。

⑨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94页。

⑩ 《汉书》，第1891页。

⑪ 《文选》，第2001页。

⑫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⑬ 《汉书》，第2338页。

⑭ 《汉书》，第2365页。

南王等相互联结，叛乱朝廷，既遭到宾客如邹阳、严忌、枚乘等的阻谏，也定当有宾客参与其中谋略规划，最终闹出“七国之乱”这样的大事。事后，公孙彊为济北王说梁王；梁孝王求为汉嗣而不得时，害怕被诛，送邹阳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sup>①</sup>可见景帝时诸侯王身边的宾客与战国的策士一样，为客人上下游说，排难解纷，实则搅扰得天下不得安宁。

武帝继位后，宾客在朝廷和地方诸侯中依然很有势力。司马迁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就反复点出在窦婴与田蚡倾轧争斗中宾客趋势附利的种种表现。宾客势力招致了武帝的反感。“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sup>②</sup>自公孙弘之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相继为武帝朝丞相，像窦婴、田蚡当权时宾客大盛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汉武帝的政策是为散在天下的宾客提供了晋升朝廷的通道，通过州郡举孝廉茂才、朝廷问策贤良文学等方式，将分散于诸侯间的宾客聚拢至朝廷，或为天子宾客，或为郡县各级官吏。《汉书·严助传》曰：“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sup>③</sup>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时，所以武帝时从乡举里选到天子策问，开辟了士人进入朝廷政治中心的通道。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提出太学养士的措施：“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提出的办法是让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贤明的吏民贡于朝廷，这样“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sup>④</sup>本来诸侯王所养皆诸子辞赋之士，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敦厚醇雅的经术来抑制纵横辩说的士风，不任职而妄论国事的游士被“得而官使”，纳入了专制制度的官僚体系中。这样便改造了过去的游士宾客之风，使天下游士宾客多入其彀中。

当然，一种措施的实行，其效果并非是立竿见影的。武帝时养士的风气依然存在，宾客依然是强大的政治势力，甚至是政治动乱的制造者。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经常与大臣公卿在朝廷辩论大事，如吾丘寿王诘难丞相公孙弘，严助诘难丞相田蚡，宾客一般善于辞令，结果是“大臣数讫”。<sup>⑤</sup>更令朝廷反感的是，宾客还在继续蛊惑诸侯王叛乱。淮南王谋反，在他的王国之内有宾客伍被等的怂恿谋划，在朝廷里竟然也有天子宾客严助的勾连内应。武帝曾告诫严助“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sup>⑥</sup>意思是放下纵横策士那一套，归心于《春秋》儒经，忠心于朝廷，可严助作为天子宾客，竟然与淮南王交私论议。“及淮南王反，事与助相连，上薄其罪，欲勿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sup>⑦</sup>特别是武帝末年，戾太子起兵谋反一事，也与宾客有关。《汉书·戾太子传》曰：“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sup>⑧</sup>戾太子“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结果是“诸太子宾客皆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敦煌”，宾客如此胡作非为，武帝对之痛恨，施以严惩，是情理之中的事。《后汉书·郑众传》载：“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sup>⑨</sup>这大约就是武帝后期鉴于戾太子之乱而新定的制度。

主父偃的悲剧可谓是汉武帝时期宾客命运的一个缩影。他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被齐地诸儒生

① 《汉书》，第 2353 页。  
② 《史记》，第 2946 页。  
③ 《汉书》，第 2775 页。  
④ 《汉书》，第 2513 页。  
⑤ 《汉书》，第 2775 页。  
⑥ 《汉书》，第 2789 页。  
⑦ 《汉书》，第 2790 页。  
⑧ 《汉书》，第 2741 页。  
⑨ 《后汉书》，第 1224 页。

所排揆，穷困潦倒。他所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sup>①</sup>正是一副战国纵横家的嘴脸。而其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从长短纵横之术转向儒家经典，应该是武帝时期多数游士宾客的共同道路。他后得到武帝的信任，依从其计，“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sup>②</sup>燕王、齐王之死，都与主父偃脱不了干系。他被公孙弘斥为“首恶”。结果武帝“乃遂族主父偃”，使其落得可悲的下场。

汉武帝采用两手对待游士宾客，一手软一手硬，一面打开选拔官吏的通道，让士人有入仕为官的途径，将自由的游士宾客编入严整的官僚体系中；一面采用极端严厉的手段诛灭游士宾客。东方朔《答客难》所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感慨，不是凭空虚拟，而是有现实基础的。<sup>③</sup>经过武帝这两手，此后的宾客率皆无赖之人；而且养士也不再是流行的风气。大将军卫青就曾说：“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sup>④</sup>司马迁也反复讥讽游士宾客乃势利之交。<sup>⑤</sup>宣帝时，杨恽被免为庶人，居家，治产业，起室宅。安定太守孙会宗颇有智略，写信警戒杨恽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杨恽不听，结果因有怨望之词而被诛。汉代甚至出现过宾客犯法主受连坐的法律。<sup>⑥</sup>可见，专制秩序建立之后，就不容许宾客在其中纵横捭阖，威胁政治结构的稳定了。扬雄《解嘲》所谓“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sup>⑦</sup>正是对西汉中后期政治高压下宾客政治衰落状况的写实。

随着宾客生存空间的挤压，宾客自身也是每况愈下，甚至沦落为鸡鸣狗盗之徒。汉成帝不亲政事，贵戚骄恣，交通宾客，藏匿亡命，均导致京都治安混乱。“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sup>⑧</sup>这些宾客不能够左右上层政权，只能凭气力干一些劫财越货、鱼肉乡里的勾当了。西汉末年，一方面朝臣“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另一方面，朝廷又在不断地制裁游侠养客，如哀帝时高密豪族郑崇，多交通宾客，被下狱，穷治而死；<sup>⑨</sup>辛庆忌的长孙与平帝从舅卫子伯相善，两人俱游侠，宾客甚盛，结果王莽将辛的家族全部诛杀。<sup>⑩</sup>唯独王莽“交结将相卿大夫，救贍名士，赈于宾客，家无余财”，让在位者推荐他，游谈者为他造舆论，于是“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sup>⑪</sup>终而成为窃国大盗。扬雄正是在此政治环境中，既明哲保身，也表现出不同流合污的超然。

### 三、东汉“崇儒抑侠”与班固《答宾戏》

两汉之交出现了新的乱世，又为宾客的滋生繁盛提供了政治土壤，宾客豪强又纷纷出现。但是这时的宾客，不像西汉初年多诸子辞赋之士，而是多报仇杀掠的豪强。对此陶希圣曾著文列举：赤眉的先驱者吕母密聚客，规以报仇；困光武于邯郸的王郎是赵国的豪侠；天水的隗嚣多宾客；更始皇帝刘玄也是结客报仇的侠士，刘玄的族弟刘伯升也是结客的大侠；光武帝起兵后，刘植、耿绳、

① 《史记》，第2961页。

② 《汉书》，第2803页。

③ 《文选》，第2001~2002页。

④ 《史记》，第2946页。

⑤ 参见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传》之“太史公曰”。

⑥ 参见《汉书·何武传》。

⑦ 《文选》，第2009页。

⑧ 《汉书》，第3268页。

⑨ 《汉书》，第3257页。

⑩ 《汉书》，第2998页。

⑪ 《汉书》，第4040页。

岑彭、吴汉、臧宫、王霸、祭遵、傅俊等都率宾客归汉。<sup>①</sup> 历史好像是在重新上演一遍似的。在乱世之中，群雄逐鹿，光武帝本身就是依靠宾客的力量重新夺取大汉江山的，这正如刘邦之任侠好宾客而取得天下。依靠豪侠宾客可以在乱世中夺取天下，但是治理天下必须依靠儒士经术而非宾客豪强，“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历代统治者都是明白的。因此一旦江山稳固之后，面对“建武之初，雄豪方扰，嘘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的局面，<sup>②</sup> 光武帝和后来的明帝、章帝都大力推崇儒学，抑制豪侠。刘勰曰：“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sup>③</sup> 这种情况也正如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崇儒的同时，也自然须要重新抑制豪侠宾客，虽然东汉后来的政治格局并未能真正抑制豪强大族，但是在前期，崇儒抑侠是基本的价值观。一方面是豪侠宾客势力的萌动崛起，一方面是国家在政治措施和思想文化上强力贬抑豪侠宾客，“捕诸王宾客，死者千余人”。<sup>④</sup> 明帝永平年间，楚王英之狱，“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sup>⑤</sup> 这种维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

又如东汉开国功臣伏波将军马援，在陇西依隗嚣时曾“宾客故人，日满其门”，但是振旅还京师归附朝廷后，他上书请允许宾客屯田上林，将这些不事生产的豪侠转变为自食其力的耕作劳动者。马援在建武初年就预见到诸皇子并壮，不防微杜渐，而广通宾客、门庭如市，必然会招致灭顶之灾，后来果不其然。侄女婿王荅在京师交结诸侯，马援告诫说：“今若在京师长者间用气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sup>⑥</sup> 侄子“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马援诫侄子书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勅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sup>⑦</sup>

龙伯高敦厚谨慎，是儒家人格的典范；杜季良豪侠好义，是乱世豪杰，马援对二者的褒贬态度非常鲜明。这正说明东汉政权建立后，社会从乱向治，人生理想和人格典范也相应地从豪侠转向了儒士。这种转向是与国家意志相适应的。这就是班固《答宾戏》的社会文化背景。

再看坎壈失志的冯衍。他在《显志赋》里列举了大量的古代人物，而态度也是显有不同的：

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谲功。忿战国之遭祸兮，憎权臣之擅彊；黜楚子于南郢兮，执赵武于淇梁。善忠信之救时兮，恶诈谋之妄作；聘申叔于陈蔡兮，禽荀息于虞虢。诛犁锄之介圣兮，讨臧仓之愬知；爨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

① 陶希圣：《王莽末年的豪家及其宾客子弟》，《食货》1937年第6期，第46~50页。

② 《后汉书》，第872页。

③ 《文心雕龙注》，第673页。

④ 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⑤ 《后汉书》，第1430页。

⑥ 《后汉纪校注》，第224页。

⑦ 《后汉书》，第844页。

夷仪。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寢淫而弘大。援前圣以制中兮，矫二主之骄奢；馑女齐于绛台兮，飡椒举于章华。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风；褻宋襄于泓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摭仁智之英华兮，激乱国之末流；观郑侨于溱洧兮，访晏婴于营丘。日曚曚其将暮兮，独于邑而烦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驷素虬而驰骋兮，乘翠云而相伴；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务光而愈明。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钦真人之德美兮，淹踌躇而弗去。意斟愜而不澹兮，俟回风而容与；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许由于负黍。轹吾车于箕阳兮，秣吾马于颍潁；闻至言而晓领兮，还吾反乎故宇。<sup>①</sup>

冯衍标举的是周、唐（尧）之盛德。对于齐桓、晋文之逞谲功而霸，战国以降权臣之擅强遭祸，兵革苦攻年年不断，他都持鄙夷斥责的态度。文中铺陈了黜楚子、执赵武、禽荀息、诛犁锄、讨臧仓、沉孙武、斩白起、流苏秦、幽张仪、燔商鞅、烧韩非、诮始皇、投李斯等等，表达的是对僭越礼制、犯上作乱、巧诈纵横的谴责。馑女齐、飡椒举、褻宋襄、表季札、观郑侨、访晏婴等等，则表达了对忠信救时者的礼赞。而伯夷、务光、伯成子高、善卷、许由等隐士，正是冯衍心目中的真人。冯衍钦慕其德美，表达了隐世以独善的志向。可见冯衍这篇《显志赋》，虽多坎壈不平之气，但在人生价值观上与当时的“崇儒抑侠”主流思想是一致的。

这种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加以褒贬而表达志向的叙写方式同样表现在班固的《答宾戏》中。班固称战国游说之徒为“衰周之凶人”，并予以贬抑，又花费大量笔墨列举了从皋陶到汉张良等建策展勋的“立功”之人，从陆贾到扬雄等“立言”之人。但是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这些古人都不是班固标举的最高典范。“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阳，柳惠降志于辱仕，颜潜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sup>②</sup> 班固提出真正的人生典范是伯夷、柳下惠、颜渊、孔子之类“立德”之人。真正的“立德”之人，“时暗而久章”，暂时晦暗，终究必然能彰显于世。这又呼应了《答宾戏》开篇班固所谓“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人生志向。这就是班固“所守”的“正道”。

再看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对游侠作出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司马迁首先为游侠列传，称赞他们“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但是在班固之父班彪看来，“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正是司马迁大敞伤道的罪过之一。班固《汉书》虽然列有《游侠传》，但是他站在儒家礼法上贬斥游侠“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sup>③</sup> “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sup>④</sup> 班固在《汉书》中表露出“崇儒抑侠”的人生价值观，与《答宾戏》是一致的。一直到东汉末年，荀悦依然抨击游侠、游说、游行“德之贼也”，可见这的确是汉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 四、结语

通过梳理汉代宾客之盛衰和“崇儒抑侠”价值观的形成，我们再来看班固《答宾戏》的主旨。

① 《后汉书》，第994~995页。

② 《文选》，第2020页。

③ 《汉书》，第3697页。

④ 《汉书》，第3699页。

汉代大一统政权建立后，有不少人依然做着“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美梦，但是策士宾客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一和稳定，于是朝廷采取严加诛灭和开通仕途两种路径以消纳之。至东汉再兴，豪强宾客再度蠢蠢欲动，朝廷采取“崇儒抑侠”的措施。“崇儒抑侠”既体现在班固《汉书》之中，也表现于《答宾戏》。《答宾戏》花费大量笔墨铺排战国游士宾客的悲剧，否定游说之徒非君子之法；立功则须“俟命而神交”，不可妄动。立言可以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而伯夷、柳下惠、颜渊、孔子等儒家圣贤才真正是“吾徒之师表也”，坚守正道虽然暂时沉潜晦暗，终将彰显于后世。这既是为作者“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确立合理的思想根基，也是为当时的士人指出了“立德”、“立言”的正道。如果仅仅将它理解为“自通”，则是本末倒置，掩盖了班固的基本意旨。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 An Explanation of the Theme of Ban Gu's *Da Bin Xi* with a View to the Vicissitudes of Guests in the Han Dynasty

Zhou Xinglu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n the theme of Ban Gu's *Da Bin Xi* (答宾戏, Reply to a Guest's Banter), an important work in Han Dynasty. Although there is "intertextuality" among Ban Gu's *Da Bin Xi*, Dongfangshuo's *Da Ke Nan* (答客难, Answer to a Guest's Challenge) and Yang Xiong's *Jie Chao* (解嘲, Self-Consolation), the author has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s on "Da Han" (大汉, the Great Han Dynasty) and "Zhan Guo" (战国, the Warring States). Ban Gu criticized the host and the guest in the form of the dialogue for "cherishing memor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in such a magnificent era and flaunting what is heard while disbelieving what is seen". Early Han Dynasty was teemed with roaming scholars and hangers-on to aristocrats. Emperor Wu of Han opened channels for them to fill government official posi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took extremely severe measures to wipe them out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n on, the group went from bad to worse, and was reduced even to a band of scoundrels. Such is the context in which Dongfangshuo and Yang Xiong composed their pieces. In contrast, Emperor Guangwu, Emperor Ming and Emperor Zha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ighly revered Confucianism while suppressing such hangers-on as the gallant men again. Admiring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suppressing the gallant swordsmen was the general social value, which was also reflected in Ban Gu's *Da Bin Xi*. This work not only established a logical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Ban Gu's devotion to Confucianism, but also blazed the right way to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expounding ideas" for his contemporary scholars.

**Keywords:** Ban Gu; *Da Bin Xi*; guests; admire Confucians and suppress gallant men